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中国现代文学史

## 1917—2012 (上)

(第二版)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1917—2012

朱栋霖 朱晓进 吴义勤 主编

本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以“一人”的观念嬗演中国现代文学史进程，  
重新阐释二十世纪文学经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2 (上) (第二版)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1917—2012



朱栋霖  
朱晓进  
吴义勤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2. 上/朱栋霖等主编. —2 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6

(博雅大学堂·文学)

ISBN 978-7-301-24212-4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1917—2012—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9419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2(上)(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朱栋霖 朱晓进 吴义勤 主编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212-4/1·276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4.25 印张 422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2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 目 录

## 上 册

- 导 言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1
  - 第一节 人的发现与文学史构成/2
  - 第二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开端/7
  - 第三节 文学观念的变革/9
  - 第四节 文体叙述的创新/16
-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25
  - 第一节 五四文学革命/25
  - 第二节 五四文学思潮与论争/29
  - 第三节 新文学社团流派/34
- 第二章 20年代小说(一)/39
  - 第一节 20年代小说概述/39
  - 第二节 叶绍钧 许地山/47
  - 第三节 郁达夫/50
- 第三章 20年代小说(二)/57
  - 第一节 鲁迅的文学创作/57
  - 第二节 《呐喊》《彷徨》/63
  - 第三节 《故事新编》/76
- 第四章 20年代新诗/80
  - 第一节 20年代新诗概述/80
  - 第二节 郭沫若/87
  - 第三节 徐志摩 闻一多/91
- 第五章 20年代戏剧/97
  - 第一节 20年代戏剧概述/97
  - 第二节 田汉/106

# 目 录

- 第六章 20 年代散文/112
  - 第一节 20 年代散文概述/112
  - 第二节 周作人 朱自清等/117
  - 第三节 《野草》/123
- 文学大事记(1897—1927)/129
- 第七章 30 年代文学思潮/139
  - 第一节 人文主义文学思潮/140
  - 第二节 左翼革命文学思潮/148
- 第八章 30 年代小说(一)/161
  - 第一节 30 年代小说概述/161
  - 第二节 丁玲等 /172
  - 第三节 新感觉派小说/177
- 第九章 30 年代小说(二)/182
  - 第一节 老舍的小说创作/182
  - 第二节 《骆驼祥子》/188
- 第十章 30 年代小说(三)/192
  - 第一节 茅盾的小说创作/192
  - 第二节 《子夜》/196
- 第十一章 30 年代小说(四)/201
  - 第一节 巴金的小说创作/201
  - 第二节 《激流三部曲》/206
- 第十二章 30 年代小说(五)/211
  - 第一节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211
  - 第二节 《边城》/217
- 第十三章 30 年代新诗/220
  - 第一节 30 年代新诗概述/220
  - 第二节 戴望舒 卞之琳/226
- 第十四章 30 年代戏剧/234
  - 第一节 30 年代戏剧概述/234
  - 第二节 曹禺与《雷雨》、《日出》等/243
- 第十五章 30 年代散文/257
  - 第一节 30 年代散文概述/257

# 目 录

- 第二节 鲁迅杂文/262
  - 第三节 林语堂 何其芳/266
- 文学大事记(1928—1937)/272
- 第十六章 40年代文学思潮/279
  - 第一节 国统区文学思潮/280
  - 第二节 解放区文学思潮/285
- 第十七章 40年代小说(一)/296
  - 第一节 40年代小说概述/296
  - 第二节 《围城》/307
  - 第三节 张爱玲/310
- 第十八章 40年代小说(二)/313
  - 第一节 现代通俗小说概述/313
  - 第二节 张恨水/316
- 第十九章 40年代小说(三)/325
  - 第一节 解放区小说概述/325
  - 第二节 赵树理 孙犁/329
- 第二十章 40年代新诗/336
  - 第一节 40年代新诗概述/336
  - 第二节 艾青/343
  - 第三节 九叶诗派/347
- 第二十一章 40年代戏剧、散文/353
  - 第一节 40年代戏剧概述/353
  - 第二节 郭沫若的历史剧/362
  - 第三节 40年代散文概述/368
- 文学大事记(1937—1949)/372
  
- 后 记/378
- 第二版后记/381

## 导 言

#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自 19 世纪末到 1917 年的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二十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有了这个文学现代化发生的先导和基础,才有了五四后 30 年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

20 世纪初年,清王朝覆灭,民国初年政坛剧烈动荡,文化领域尚未出现革命性变化,但是,戊戌变法以至辛亥革命前后,在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激烈的撞击中,中国社会的震荡日益激烈,中华民族被震惊而奋起,启动了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不可遏止。在政治领域,激烈的社会革命取代了温和的维新,推翻了王朝的世俗政治权力正在寻求建构自己的合法性,现代民族国家在强权与专制的夹缝中艰难地走上独立的长途;在经济领域,沿海的城市在西方世界殖民过程中依靠输入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移植的过程中形成;在社会领域,一方面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传统社会的秩序衰落,新的社会集团与阶层日渐成形;在文化领域,现代进程首先表现为现代文化的生产机制逐步建立,具有现代思想的新型知识阶层逐渐长成并进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sup>①</sup>。新型知识阶层利用文学作为政治改良、社会变革工具的功利主

---

<sup>①</sup> 关于新型知识阶层的兴起,可参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1 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第 3 章第 4 节,中华书局 1981 年版;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 1995 年版;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

义意识,和以文学为人生的探索、表现,保持文学独立审美价值的纯文学意识,以前所未有的歧异形态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内在张力。文学创作在传统基础上酝酿着重大的改良与革新。

## 第一节 人的发现与文学史构成

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当然是19—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运动与变革。这是最本质的。但是,什么是推动与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

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谓“人”的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不断发展、嬗变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史与人类发展史。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与认识自我的历史,也是人类面对自我如何协调、平衡、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过程。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观念的演变的历史: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如何发展与实现自我?我们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落脚点和归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来指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共产党宣言》同样指出,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人类的目标。

人类对自我的发现与认识,也决定了文学的发展。

古人对“人”的发现与认识,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上古人怀着对自然的恐惧、神秘、崇拜与憧憬,形成了上古时代原始朴素的“天人合一”观,上古神话就反映了上古人对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憧憬、恐惧与探索。儒家理念以仁为本,“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以人性与伦理道德的谐调关系为主体,构建仁、义、礼、智、信等人的行为规范,形成了以封建宗法观念为基础的传统的理性人文主义。老庄主张“无知无欲”、“适性逍遥”,以“虚



静恬淡”为道德之至。佛家主张人生本质乃痛苦、解脱、修行,主张“本无”、“无常”、“性空”,禅宗主张“心性本净”、“万法尽在自心中”。有儒家人学观,就有古代千年繁若星汉的言志抒情之作;有老庄“适性逍遥”、“虚静恬淡”论,就有陶渊明、王维、苏轼、马致远等人的清新脱俗;有禅宗“心性”、“禅悟”说,才有以诗谈禅、以禅趣入诗,才有“妙悟”、“顿悟”、“性灵”、“神韵”说。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明代中叶新的社会发展因素涌动,市民阶层诞生,于是有对“人”的新的发现。新的人学观质疑、挑战程朱理学,有“天理人欲之辨”。王阳明创心学,提出“心,即是天理”,“良知是尔家的准则”,“致良知”,回到自己的本心。王艮标立心学左派,“人性之体,即是天性之体”,“身与道原是一体”。李贽独创“童心”说,“人道即是天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萌动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末的中国反叛的个性主义思潮,激发出中、晚明新的文学观念的发展,各种新的长篇叙事性文体创作的勃兴。从吴中才子唐伯虎、祝允明的疏狂脱略,徐文长的狂放不羁、为情而作,到公安、竟陵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金圣叹独标“才子书”、力赞《西厢记》为“天地妙文”,从汤显祖尊情抑理的《牡丹亭》、冯梦龙等以“情教”代“礼教”的“三言”和“二拍”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对人性、人情、人欲、人格的刻画,以及诸多人情、言情、艳情小说的问世,到晚明晚清闲适、人情、香艳小品,乃至沈复《浮生六记》等等,都反映了对“人”的新发现与文学创作中新的“人”的观念的活跃、涌动。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裂变,梁启超倡“新民”说。所谓“新民”,就是新的“人”的观念。这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的呼唤。梁启超的“新民”说剥落了封建君主、宗法家族的囚束,属于国家,属于社会,称为“国民”。所以近代新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

五四文学倡扬个人的旗帜,胡适宣传“易卜生个性主义”,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五四对“人”的个性主义的发现,被学者称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的观念具有20世纪文化的现代性。在这一“人”的理念基础上产生了五四文学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有《狂人日记》对“人”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考,有《阿Q正传》对旧“人”的反思,有《沉沦》中人性的表现,有《女神》青春的放歌,有新月派的人性抒发。

“文学是人学。”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是又一意义上的对人的发现。各种创作方法的形成决定于创作主体从何角度发现人、思考人。看重人的社会性、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

系的,就形成现实主义;着眼于人的心灵情感的,则倾向于浪漫主义;而认定人的心灵真实、潜意识的深刻性的,就走向现代主义。这些都包含于“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深刻性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百年发展史上,尤见如此。

文学史,就是在创作主体、创作对象(文学形象)、接受主体(阅读与批评)的三个层面上,实践与表现着对“人”的不断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由文学如何实践与表现这一不断演变着的“人”的观念,而构成着,丰富着,发展着。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两种或多种“人”的观念、“人”的声音的对话、交流、对抗、激荡、交融的历史。

1928年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发现了人的阶级性。这是继五四发现人的个人性、社会性再向另一端推进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的观念一贯看重人的社会性,看重社会群体与个人发展的关系,这使受西方个性主义思想影响的五四新文化与“人”的观念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个性主义人学观,五四人学观始终与人的社会性相结合。因此,关注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为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不幸命运与被压迫地位呼喊,这曾是五四时期“人”的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一关注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出发,很容易在一部分持激进思想方法的人士中产生阶级论。在有不同阶层的人存在的社会中,人必然有其阶级性。这是左翼文学对人的新发现,也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的天地。左翼文学进而以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取代人性、对峙人情,否定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革命文学派的“人”的观念与话语。当然,三四十年代还有矛盾着重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文学,有巴金、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路翎等各具特点地承传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有老舍、钱锺书等强调人的文化属性的人的观念。而第三种“人”的观念,就是近现代通俗文学中的“人”的观念:充分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传统世俗社会的大众道德与大众人性观。

综观“文革”前17年文学,是多种“人”的观念、“人”的话语在对抗、冲突、交奏。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君临文坛,阶级的、革命的人的观念与话语成为主流观念,也是“十七年”文坛唯一的关于人的话语。连续不断的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实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与话语的否定。这时期,乃有《我们夫妻之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红豆》、《美丽》、《在悬崖上》、《小巷深处》,有电影戏剧

《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第四种剧本”、《茶馆》、《关汉卿》等作品，不绝如缕地发出人性的轻微声音。这声音是轻微的，但也是顽强的。即使在《百合花》、《青春之歌》、《三家巷》这些革命小说中，“人”的声音也若隐若现。《青春之歌》以追求个性主义的林道静终于走上革命道路，否定了五四个性主义道路。但是作家以女性的笔触细致地描写了女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与婚姻问题上的选择，使这部在实质上重返 30 年代“革命 + 恋爱”模式的小说富有人情味与人性美。

在经历了“文革”将文学中的人性赶尽杀绝、以“革命性”和阶级性抹杀人性的描写后，新时期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文化寻根等一系列沿革，正是以对“人”的逐步再发现，对五四的“人”的观念的逐步再寻找，而构成新时期文学发展裂变的内在律动。

这种变化又是同外来文化所给予的强烈刺激分不开的。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展示在中国人面前。自此，中国文化、文学乃至民族心理所发生的巨大裂变，都纠结着外来文化的刺激。西方文化刺激着中国人不断发现“人”，启发着 20 世纪中国文学如何表现“人”。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第一次高潮中，从希腊文学到 19 世纪文学的众多作家被译介到中国，其中最具影响的有四位代表性人物。易卜生在五四高潮时期被《新青年》隆重推出。但是戏剧家的易卜生在中国主要是被作为思想家接受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连同他的《玩偶之家》对于夫权家庭的批判、对于妇女平等自由权利的呼喊，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倡扬个性主义的旗帜。卢梭是又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人。《忏悔录》从 1928 年至 1945 年间竟有张竟生、章独、汪丙琨、凌心勃、沈起予、陈新等六种中译本问世。这位启蒙主义思想家袒露自己本来面目的真诚与勇气，激动了许多中国人。“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卑鄙、邪恶、善良、宽容、高尚，我都如实说出来了。……全能的天主啊！把无数的众生召唤到我身边来吧，让他们听一听我的忏悔吧。……但愿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怀着同样的真诚，敢于在您的宝座前坦露他的内心，然后再看一看，哪一个敢于对你说：‘我比这个人更好。’”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巴金的小说中都有卢梭式的自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中国道德裹挟下的人性是暴风雨般的闪击，使伪道学者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尼采，曾在一些激进的文化人中产生共鸣。他那攻击一切偶像的精神与张扬超我，吻合了五四彻底反传统的精神。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也

曾在五四小说创作中引起反响,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茅盾、曹禺、沈从文等人刻画性爱与人物心理都运用了精神分析学理论。这四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对于五四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人”,从四个层次揭示了“人”的内涵。易卜生主义以理性的个人主义,使个人的自由、自尊、人格、人权在理性主义的辉耀下显现出耀眼的价值。启蒙主义者卢梭以理性主义思想呈现人性的正负面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人性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揭示,使人的真实自我获得了理性主义的确证。尼采把人的自我张扬到极致,并且颂扬了个人对传统社会的叛逆精神。弗洛伊德则揭穿人的深层意识,那在个人潜意识中涌动着的性欲。易卜生、卢梭所揭示的人,是人类对自我的理性主义认识,尼采、弗洛伊德对人的自我的非理性主义层面的揭示,使人的内涵获得了现代性。这使得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构成一个完整丰满的、现代性的人学观。五四文学、五四文学观就是建构于这一新的“人”的观念的基础上。鲁迅十分敏感地把握到文学的这一内核,他在五四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明确发出“真的人”的呼喊。

无疑地,新时期文学是对“人”的观念的寻找与恢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体现了这种“人”的观念的寻找、恢复与深入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呼应的,是西方文学的又一次深刻的影响。西方数世纪文学在新时期短短十多年中几乎都曾被介绍进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是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尼采、弗洛伊德、贝克特、萨特这四位是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上帝死了”、“力比多”、“人的荒诞性”、“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观念渗透在最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易卜生、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汤达等所提倡的传统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已为中国文坛所熟知与普遍接受,而在20年代仅为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所欣赏的尼采、弗洛伊德,在80年代再度进入中国时掀起了一阵广泛而经久的热潮。詹姆斯提出的人的意识流理论,伍尔夫、普鲁斯特、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都展示了人的深层意识的空间,这是人类对自我的一次新发现。以卡夫卡、贝克特为代表的荒诞派文学,揭示了人的生存的荒诞性,这是人类对自我处境、人与社会关系的又一次哲学的探询与发现。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美学的异彩都是汲取了这些异域的养料,共同地体现了对“人”的发现与重塑。当然,80年代上半期文学中对“人”的所谓寻找,仅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观念的恢复和再发现,是将被扼制与摧毁了的“人”的观念、“人”的形象重塑,它在观念上对五四文学并

无特别的发展。曾轰动一时的 80 年代文学,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从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存在主义热”取代了“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人的异化、人与社会对立、个人自我的尊严、当代人的失落感、孤独感,这些存在主义思想渗透在 90 年代的文学创作中。90 年代中国文学耀眼的现象——私人化写作、女性写作、先锋文学,其哲学观念无不深藏着存在主义。整个 90 年代或许并未产生足以代表这一文学时代的经典杰作,但是 90 年代文学所体现出的对“人”的新发现,“人”的观念的新发展,却是不容忽视的。

## 第二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开端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与文学已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经《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论证,许多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其起点是在 1898 年前后发生的<sup>①</sup>。“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观和进步的观念。”<sup>②</sup>“没有晚清,何来‘五四’?”<sup>③</sup>

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意识中的民族危机感日益强化,这种危机感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的译书将西方 19 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天演论》<sup>④</sup>把进化论思想引进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近代科学的眼光来思考民族命运,从人类世界发展历史的角度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于是有了强烈的变革要求,有了追随日本明治维新的想法,有了学习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自觉。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

① 参见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册,第 4—23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李欧梵自选集》,第 268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象中国的方法》,第 3 页,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④ 《天演论》原名 *Evolution and Ethics*, 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 Huxley)所著论文集。今可见到的最早严复译本封面题乙未年(1895 年),1897 年 12 月至 1898 年 2 月曾以《天演论悬疏》为名在《国闻汇编》第 2、4、5、6 册刊载,此后单行版本渐多。

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sup>①</sup>他所说的第二期的时间“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先导期基本一致。

这一历史阶段,民族先觉者们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其影响体现在:第一,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但还是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生产的法律。1906年公布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有限自由<sup>②</sup>,1910年公布了《著作权章程》(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内容与此基本相同),1911年颁布《钦定报律》<sup>③</sup>,同年《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虽未及公布,但它是民国初年暂行民法典的蓝本<sup>④</sup>。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中更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sup>⑤</sup>并且先后颁布了《出版法》、《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注册程序及规费施行细则》。这些法律从制度层面保障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二,报刊、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维新时期发生过作用的报刊传媒,在清末的十年里有了相当的规模,在民国更是大步地前进了。梁启超在1901年就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到1921年,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以上;据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含报纸一种),1840到1911年间出版小说(含翻译)二千余种,为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外部条件<sup>⑥</sup>。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销场,刺激文学的发展。报刊的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的褪减及文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992年版。

② 其所附“臣民权利义务”共九条,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③ 此报律规定“每月发行四回以上者”,交“保押费银300元”,但是“其宣讲白话报,专以开通民智为目的,经官鉴定者,得全免保押费。若专载学术、艺事、章程、图表及物价报告者,毋庸附缴保押费”。

④ 民国元年刊行的《民国暂行民律草案》“其基本体例和主要条文与《大清民律草案》没有区别”,见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 民国民律草案》之序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在第二章“人民”中列出人民得享之七大自由权,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列为第四。

⑥ 据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sup>①</sup>。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的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文化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特性。它给以具有现代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为主的、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理性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sup>②</sup>。第三,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1905年废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境地,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成形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如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周树人兄弟等即是代表。

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不断壮大的基础上,文学的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朝廷的策论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由对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阅读的理解。文学接受者的队伍随着维新、立宪和革命的进展而日益扩大,同时伴随着社会思潮的迅速更新、市场机制的调节,文学接受者也唯新是骛,推动着文学自身的变更。

### 第三节 文学观念的变革

从晚清开始,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诸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提倡“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他著名的《新民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启蒙,就是提出批判、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制造中国魂”。所谓“新民”,就是呼唤新人,这是对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现代性的呼唤。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

①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和其自身的媒体密不可分,如印刷文本和后继的电子信号。”“对于早期现代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第26、27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sup>①</sup>。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公共领域(包括文化与文学的发展)的建构,可以被认为是梁启超与他同时代知识分子关于人的现代性与文的现代性观念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也决定了中国近代新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的总体特征,并且一直影响到五四及以后新文学的整体走向。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观念都是由梁启超倡导的<sup>②</sup>。将小说、戏剧以及白话文从不入文坛的末流提升到文坛正宗的地位,这是梁启超与他的追随者对文学观念现代创新的最大贡献。和他同时的一批有识之士们又提倡言文合一,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他们的文学观念都服从于“新民”的目的,如黄人以进化论、真善美标准建构中国文学史观念,王国维强调文学“超然于利害之外”,追求“文学自己之价值”。这样,一个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就呼之欲出了。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宗,以古雅的文言为书面语言。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诗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提出来的,他在写于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说:“……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而当得哥伦布资格的诗人,“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他评价谭嗣同:“其诗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还说:“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阔远也。”<sup>③</sup>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sup>④</sup>他所说的新意境,就是“理想之深邃阔远”;新语句则是指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说明他的诗界革命是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是谭嗣同那样的“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梁启超揭起“诗界革命”的旗帜,是以诗评家的身份出现的,其保留诗歌旧形式的革命终不彻底,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sup>⑤</sup>。朱自清在《中国新

① 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李欧梵自选集》,第27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③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之二”、“之三十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公度”为黄遵宪,“穗卿”为夏曾佑,“观云”为蒋智由。

④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1989年影印本。

⑤ 黄遵宪在1868年的《杂感》中,就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的诗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语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文界革命”在中国文学现代化先导期内最有成就，然而在观念上的阐发则不多。梁启超在1897年《与严又陵书》中，曾以舆论界与文界的“陈胜吴广”自命。梁启超称自己亡命日本时的文字为“新文体”，他的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sup>①</sup>，有很强的鼓动力。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他的为文风格也可以称作“雄放隽快”。他要引进的“欧西文思”，除了有利于思想言论的自由发挥外，还有意用于破桐城古文义法。他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新文体时说：“超夙不喜桐城古文”<sup>②</sup>，他幼年作文就不走唐宋的路子，而喜欢晚汉魏晋。他像德富苏峰辈日本政论家那样，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词章中解放出来，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他在钱玄同攻击“桐城谬种”以前，就以实际创作突破了桐城古文的藩篱。

“小说界革命”声誉最著。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构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之力”的高度。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

①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